

晚清科举改革之废八股及其意义

唐汉琦

摘要:八股取士的科举程式沿用至晚清已近500年,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其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已经成为科举取士乃至整个国家培养、选拔人才的严重桎梏。鸦片战争后,以龚自珍为首的开明之士前仆后继撰文著说,呼吁废八股、改科举。然数十年疾呼不如甲午一役之败,八股取士无所取。康、梁公车上书言变法,废八股几成天下共识。戊戌维新,八股得废,虽后因变法失败八股仍旧,但终究是潮流所向,1903年八股见废,1905年千年科举停罢。一场数十年的废八股思潮最终实现其主张,开启了新教育的大门。

关键词:科举;八股;改革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呈现出衰败之势,闭关锁国,因循守旧,清王朝士大夫们仍沉浸在天朝上国,四夷来朝的自大无知之中。直至鸦片战争战败,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觉醒,龚自珍主张废除时文,改试策论,率先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顾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他们认为要想选拔救时之才,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而科举改革的首要关键则是废除八股程式的考试文体和改变狭隘的考试内容。废除八股,成为救亡图存的首要之事。

一、晚清八股流弊

清代科举选拔政治人才,沿袭明制,仍旧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程式”,考试内容限定在《四书》、《五经》之中,考试分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除殿试只考策论外,其他三级考试都要考八股文。^[1]虽然明清科举决定考生命运的乡、会试分三场,但一般只重首场《四书》、《五经》的八股文考试。由此,科举取士也就无形中被简省为八股取士。八股即八股文,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因考试命题的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又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其写作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一篇典型的八股文须由破题、承题、起

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通篇首先要求文章结构必须符合八股程式,而文意内容则居其次,更严格的是考生答题议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仿摹古人语气以“代圣人立言”。^[2]

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举定式之后,清王朝沿用至晚清末年,《四书》、《五经》命题,八股程式作答的八股取士制度已经历时近500年。《四书》、《五经》不过431286字^[3],而科举考试年复一年的出题,主考官为避免考题重复和防止考生押题,不得已或故意出一些偏题、怪题,往往令考生无从作答。尤其是童试,已成偏、怪题之“重灾区”。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描述道“断剪经文,割断圣语,其小题有枯困缩脚之异,其搭题有截上截下之奇,其行文有钩伏渡挽之法”,他举例说明此类出题之“无理无情”,“譬如《中庸》‘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去‘及其广’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如此之例,不可殚书”。^[4]以此种办法选拔人才,怎么可能选拔出救时之弊,强国御侮的人才!龚自珍对八股取士摧残、压制真正人才的科举现状忧虑不已,写下“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

作者简介:唐汉琦,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事高等教育理论(厦门 361005)

人才海内空”^[5]的诗句。他批评科举文风败坏，“今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6]魏源也很早就认识到八股取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认为八股取士根本选拔不出与政事相关的有用之才，批评八股文导致士子“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7]对八股危害人才批判最深刻且全面超越前人的是冯桂芬^[8]，尽管冯氏出身榜眼，但对八股之危害见解颇深，他在其《改科举议》中批评时文“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是“唐宗英雄入彀之术”，“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9]尽管言论过激，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八股取士的严重消极后果。不过，在中国未被西方列强武力打开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而言，这种选才办法也许仍然是有效的。但是，西方科技日益昌明，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文化科技发展之时，八股文这种内容狭隘，格式严苛的考试文体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正如郑观应在《考试下》中所指出的，“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及至外患循生、内忧叠起……而国家犹勉策驽骀，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10]因而，天下舆论以为，废除八股，改革科举，是救时御侮的第一步。

二、公车上书，倡废八股、变科举

早期改良思想家们著书立说，大声疾呼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即便是常年与西方列强交涉斡旋，知悉西学的洋务派也没有在科举改革中取得多少成就。光绪元年（1875年）礼部奏请科举开算学一科，然而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才将算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但规定每20名考生取中1名，且至多不得超过3名，次年戊子科（1888年）乡试，仅取中算学举人1名而已。^[11]这样的科举改革速度与力度，显然对全国新式人才的培养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而废除八股，改试他法之事更是遥遥无期。1894年甲午中日一战，中国惨败，朝野内外，无不震动。尤其是士林群体，强烈的爱国自尊受到极大的冲击。1895年4月，从日本传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正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群情激愤，由康有为、梁启

超领导发起“公车上书”运动，起草万言书，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法图强。

在教育改革方面，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主张“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请求“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而对于科举文科，康有为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恳切者入翰林。”^[12]

这些改革科举的举措，从考试内容上已经完全摒弃了《四书》、《五经》限定的范围，初步具备了现代科学的内容。文科科举虽然还要求考《四书》、《五经》，但考试内容也大大拓宽，增加了国内外历史等。尤其是取消了八股文体的格法限制，作答内容也不再限定在《四书集注》等书内，甚至取中名额也不再限定，及格即取。如果说武科改革最大的变动在于改为艺科的话，那么文科改革最有意义的地方即在于废除了八股考试文体，扩大了考试内容，增加了选才的途径，若能推行，其对于人才的多元培养也是影响非凡的。

一直主张学习西方的著名思想家严复，1895年3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著名政论文《原强》，主张变法图强最重要的政治举措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指出“民智者，富强之原”，批判“记诵词章”、“训诂注疏”的学风，“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批评终日沉溺于八股制科中的学子是非不辨，人情物理糊涂，有时甚至不如农工商贾处事恰当。提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13]大声喊出了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代强音。在严复看来，不仅八股当废，科举其他考试文体也当废不可。同

年5月、6月严复再次在《直报》发表重要文章《救亡决论》重申变法救亡必先废八股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指出八股之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八股摧残人才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阐明当前国家面临的艰难形势，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与废八股”。^[14]梁启超也于1896年发表《变法通议》，在论科举一文中，提出改革科举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合科举于学校”，中策“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15]尽管在梁启超的科举改革措施里中下策还保留了八股程式的考试文体，但考试内容则要求扩大至西学各科。对于八股时文阻碍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批判，还有多人论述，如徐勤1897年发表的《中国除害议·除不学之害》，直陈“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题，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试帖之诗……”则变法自强将会南辕北辙。^[16]废八股已经浩浩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

三、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八股终得废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改良思想家们抓住国人思变的心理，利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广泛宣扬西学，鼓吹变法，设计变法路线，“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7]然要变科举，必先废八股。1898年6月11日，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及部分开明官僚的不懈努力，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开始。面对国内外紧张局势，康有为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改变了他在公车上书时仅对科举进行部分形式上改革的想法，直言改革科举必先废八股。指出“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为了充分说明废八股的正确性，康有为考察了中国从古至今选才取士制度，追溯了八股考试文体的起源。认为八股起源于宋代王安石为去除诗赋考试之浮华寡实，帖括之迂腐无用而改革科举，以经义取士，了解应举士子能否通经致用。八股“立法之始，意美法良……当闭关之世，虽未尽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然自明以降，“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

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加上明清科举三场考试只重首场，士子读书范围更加狭窄，“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导致读书士子知识贫乏，眼界狭隘，巍科进士、翰苑清才，竟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更不用说近代西方新学，世界各国历史地理了。^[18]康有为认为八股试士，闭关愚民，束缚人才，蒙蔽士民才智而已，甚至认为中国割地败兵，也是八股所致，他说“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19]因此，为选拔救时之才，消除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主张立即废弃学非所用的八股。同时，为减少守旧群臣的阻挠，他力劝光绪“勿下部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其今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

奏折呈上，光绪虽极为认同，但废八股兹事体大，一时之间难以决断。为了帮助光绪下定决心，同时争取更多朝臣的支持，康有为又先后为宋伯鲁、徐致靖代拟奏折请求光绪颁布明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梁启超等也上《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附议“由于科举乏才，请特下明诏，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20]光绪废八股的上谕拟定之后，因“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而阻挠最力者当数刚毅，先是“请下部议”，又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再言“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21]，阻挠废除八股。6月23日，光绪终于下定决心，发布上谕：“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童生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22]其实不只守旧群臣不愿废除八股，即便是洋务派重臣张之洞，虽然也主张变科举，但也只是“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并不主张完全废八股，认为《四书》文《五经》文可以考察士子是否“通达时务、研求新学”之外仍“宗法圣贤，见理纯正”。^[23]康有为恐守旧群臣阻碍明诏执行，动摇光绪推行科举改试策论的决心，于6月30日再代

宋伯鲁拟折上《请废八股勿为所摇片》，极言废八股是“国家之大利”，希望光绪“持以毅力，勿为所摇”，严惩奏请复用八股试士的大臣。^[24]同一天，光绪颁布上谕，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同时要求各省学政一接到谕旨，即将生童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25]至此，维新变法之变科举，废八股的改革举措取得初步胜利。不料风云突变，1898年9月21日，慈禧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吁请太后训政”，密令缉捕康、梁等维新派志士。维新变法失败，科举改革的诸多措施也尽行罢废。10月9日，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26]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京城。走投无路，痛感国力衰弱，非改革不可的慈禧及清廷上下，又开始恢复戊戌变法中诸多改革举措，是为“清末新政”。1901年8月29日，颁布上谕科场“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27]1905年9月，“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8]八股不仅得以废除，科举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四、意义：为新教育扫清障碍

八股文在科举选才方面的弊端，自明至清，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在野文人士子，均对此心知肚明。故因此有康熙初年废科场八股，历数年又恢复时文；乾隆时更有大臣激烈相争，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八股取士制度改用他法，礼部大臣反驳，科举之法，历代沿用，莫不有弊，八股时文，亦积弊丛生，然除此之外，并无良法美意以代之，因此不在于有弊，而在于因时而补救之^[29]。因此，八股取士是古代中国选士制度历经察举之乡举里选、九品中正制、分科取士之后的一个折衷和综合，是为维持社会最起码的上下流动的较为公正的举措。对于应举的文人士子来说，八股时文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而已，不管是追求真正的学问还是只是追求仕途荣耀，只要敲开了官员士子这个圈子的门，这块“砖头”也就扔掉了。所以，自明至清，清醒的大儒文人，诸如王阳明、袁枚、章学诚等人把八股比喻为“赘”（见面礼）、为“媒”、为“假

道于虞”等等。^[30]

因此，废止八股时文，乃至停罢科举，与其说是否定传统选才方式的不合时宜，不若说是传统文化因八股取士难以进行现代性转化，从而拘泥于落后时代需要的传统教育，无法开启西方式的新教育。至于科举考试制度，其本身体现的是“公开考试，公平竞争”的精神，因与八股文这一考试文体相捆绑而一同消亡，但其精神又在现代考试中得以重生。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废八股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新教育扫清障碍，为建立近代学校制度，实现育才于学堂解开了千年桎梏。而至于选才，当今世界及中国的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已证明，选才始终无法舍弃“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考试制度。

参考文献：

- [1][3][11] 刘海峰.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88-89、94、109.
- [2] 刘海峰. 八股文百年祭[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 [4][16][18][20][22][24][25]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62-77、39.
- [5][6] [8] 陈兴德. 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4、36.
- [7][9][10][12][13][14][15][17][23]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8、22、44、98、177-178、188-191、138-140、133、252.
- [19] 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M]. 中华书局，1992：42.
- [21][26][27][28] 刘百合. 戊戌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5）.
- [29][30] 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郑芳）

The Abolishment of the Stereotyped Wri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Significance

Tang Hanqi

Abstract: Up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tereotyped writing lasts nearly 500 years. As the special styl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ts disadvantages have become completely unmasked and become the serious shackle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even national selection of talents. After the Opium War, led by Gong Zizhen, the enlightened men fight one after another for abolishing the stereotyped writing and reform imperial examination. However, decades of outcry is less than the defeat of Jia Wu War, and stereotyped writing serves nothing. After Gongche Shangshu movement led by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and Wu Xu reform, stereotyped writing is abolished in 1903. In 1905,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bolished as well and a door for new education is opened.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tereotyped writing, reform

(上接第 53 页)

Action Research into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 America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Wang Hongcai

Abstract: Train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core goal of China'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t needs a systemic reform, and must be fulfill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at las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the teaching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the design of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Sino America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tudents learn how to know the difference of two models, 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f research method, and develop their research ability. This "learning from doing" way is very helpful for fostering student's practice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t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changing ou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ory-center to application-center.

Keywords: Sino America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omparison, action research, course teaching